年迈的“八一”号已经不能再在铁路上运行，四方机车厂最终决定通过汽车将其运回。于是，为了把近百吨的“八一”号拉回家，南车青岛四方公司安排了三辆大平板车，将机车整体分解成三部分，用了三天三夜跨越上千公里才让它平安归来。

第一台国产蒸汽机车诞生记

□ 本报记者 任宇波

1952年8月1日下午，青岛四方铁路工厂(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前身)厂区外热闹非凡。当一辆身披彩绸，鸣着汽笛的蒸汽机车，在明媚天光中向在厂区外等候多时的2700多人缓缓驶来时，歌舞声、欢呼声顿时淹没了汽笛声，兴奋与激动在人人脸上荡漾开来。

这辆被命名为“八一”号的解放型蒸汽机车(ㄇㄅ1型2102号)虽早已“退役”，但它却是中国第一台自己研制的蒸汽机车，在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史上，是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古老国度，就走进自主研制蒸汽机车的新时代了。这一声汽笛，一阵歌舞，一片欢呼，便把那“万国机车博物馆”的戏谑与尴尬正式结束了。

“万国机车博物馆”

铁路是不可或缺的“大动脉”。1952年，国内“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进一步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正蓄势待发。国际上，北纬38°线附近的战火正在猛烈燃烧，抗美援朝亟待后方支援。然而，铁路要先行，却被铁路设备拖住了后退，成为制约交通运输的“瓶颈”。

自1876年中国土地上出现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以来，直到建国初期，在中国土地铁路线上奔跑的所有机车，均是英美德日等国的旧蒸汽机车，无一辆是国产。据1949年的统计数据，中国可统计的机车有4069台，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

为解决铁路运输设备落后的难题，经过慎重考虑，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决定将研制生产新型蒸汽机车的任务交给四方铁路工厂，也就是四方机车厂。

四方机车厂建于1900年10月，初名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属德国德华山东铁路公司下辖机构，是继唐山、大连两厂后第三家出现于中国的铁路机车车辆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四方铁路工厂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改称铁道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工厂，简称四方机车厂。自1900年建厂直至1949年，四方机车厂只能使用国外进口零部件组装机车，从未真正制造过一台机车，至1949年以后才扭转了这种情况。

当时中国铁路系统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制造机车车辆的能力，短时间内还只能以修修补补为主。在铁道部和青岛市军管会(1950年9月为青岛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四方机车厂于1949年成功抢修了“中苏友好”号机车。1950年9月，四方机车厂又修复组装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台蒸汽机车，铁道部将这台2-8-2轴式的蒸汽机车定型为“ㄇㄅ1型”，编号2101。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表示祝贺，并亲自为其命名为“国庆周年号”(简称“国庆号”)。这台机车在1959年变更型名后改为“解放型”(JF)。在这两次成功改造的基础上，四方机车厂积累了有关技术数据和丰富的研制经验。加之该厂建厂早和技术力量较为雄厚，此时有新老设计技术人员3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也干劲十足，为研制新型机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到铁道部的命令后，四方机车厂首先召开了党委会议，成立了由党委书记韩健民、厂长刘伟、经营副厂长铁峰、技术副厂长陈泰棣、骨干技术人员任允文等，以及被誉为“机车活字典”的老工长贾培谟、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丁学文等人组成的新型机车设计小组。他们经过反复研究琢磨，严密论证，终于设计出了“解放”型干线货运蒸汽机车。从设计效果图上看，该型机车功率大，速度快，而且降低了单位功率的蒸汽消耗量和金属消耗量，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机车的技术性能，为早日生产出新型蒸汽机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筚路蓝缕，攻艰克难

至今不少老职工还记得，朱德总司令到四方机车厂视察的事情。根据工厂史志记载，1952年4月，在四方机车厂各场、工段加紧研制、运作的关键时期，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志在山东省委、青岛市有关负责人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地亲临四方机车厂视察。在听取厂党委书记韩健民的汇报后，他对工厂自行研制机车寄予厚望，作出了“四方机车厂工人要为中国人争气，造出自己的国产机车”的重要指示。

朱总司令亲临四方机车厂视察指导的消息，给工厂员工以极大的鼓舞。“一切为国家建设着想”、“一切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成了全厂干部工人的决心和动力。从设计人员到各级领导干部，从青年学徒到老工人师傅，都积极响应工厂党委的号召，迅速掀起了技术革新、攻克难关、创造生产记录的热潮。

虽然当时的四方机车厂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修造经验，但要自己制造机车，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机车制造的关键技术都由国外厂家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靠自己的摸索来克服困难。

技术革新首先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展开。陈泰棣、任允文等对解放初期的车轴坯供应不足的问题，用电炉冶炼的优质碳素钢铸冶出合格钢锭。他们还发明了将机车的部分零用部件用球磨铸铁材料生产的先进方法，有力地解决了原先设计图纸中的难以预见的问题。刚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分配到工厂的青年技术人员顾家鸊，在技术革新中发明了“扒缸机”，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青年工人在技术革新中也毫不示弱。如锅炉安全阀过去主要靠进口，质量还不过关，而其质量又直接关系到火车头的安全。为了攻克这一难关，工人于兴泰专心研究，废寝忘食地制作模型，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新的安全阀，解决了限制压力范围的质量难关。以唐宗玉名字命名的“唐宗玉气缸铸造小组”，大胆采用了前苏联郭瓦廖夫流水作业法，并结合制动轴承载风包的实践经验，使制造每个汽缸由70多个工时缩减到26个工时，在同行业中创造了全国纪录。

很多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老工人也解决了很多重要的技术难题，为新型机车早日出厂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时年55岁的共产党员、老技师贾培谟，解决了蒸汽机车中噪音过大、耗汽量过多、速度不快等许多关键问题，被全铁路上下誉为“机车活字典”。

月牙板是机车上很重要的部件之一，表面硬度很高，需要进行表面渗碳处理，但其中的技术参数却无法得知。当时，工厂里没有完备的化验室，化学药品也不多，而有关的技术知识更不足。老工人丁学文决心搬掉这只拦路虎，他白天去商店询问化学药品的含碳情况，晚上恶补化学知识，并经过反复试验，这一难题终于被攻克。

在攻克了一系列重大难题之后，小组成员又研制生产了火车头上的10000余个大小零部件，经过安装调试，终于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迎来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火车头试车的关键时刻。

7月26日清晨，四方机车厂接到铁道部命令：“新造机车经请示部长，为迎接‘八一’，可命名为‘八一’号。”喜讯传来，贾培谟、王子立等代表全厂职工向厂长刘伟请缨试车。

当日，在胶济铁路的试行轨道上，新型机车风驰电掣般行驶着，速度一直加到72——75公里，而且行驶过程中，车身不跳不摆。经过认真测定，新型机车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中午时分，当新型机车徐徐返回四方机车厂时，刘厂长高兴地向等候已久的职工们庄严宣布：“我们创造了试车一次成功的新纪录！”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四方机车厂成功地试制出新中国第一台“八一”号解放型蒸汽机车，不仅结束了中国不能独立制造机车的历史，更翻开了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史上崭新的一页。

1952年8月1日，四方机车厂举行了隆重的下线典礼。“八一”号机车，身披红绸，接受青岛市党政领导及广大职工的检阅……随后“八一”号驶向北京，肩负起抗美援朝和建设祖国的重任。

40年辛劳，退役荣归故里

“八一”号蒸汽机车重92.07吨，车长22.6米，构造速度80公里/小时，模数牵引力236千牛。在青岛下线后，它马上走上繁忙的工作岗位，首个重要任务是支援抗美援朝。

“八一”号服役后，表现出了优良的工作性能。从1952年至1960年，四方机车厂共生产了216台该型蒸汽机车，成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铁路运输的主型蒸汽机车。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八一”号开始在国内铁路线路工作。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该机车始终奔驰在铁路线上，为祖国铁路运输和经济建设服务。

1992年5月30日，解放型“八一”号蒸汽机车在淮南机务段光荣“退役”。但“八一”号从退役到回家的18年，历经坎坷波折。原来，1992年5月退役后，它一直被当做一辆普通的报废机车，停放在淮南机务场站的一个角落里。如果不是大同机车车辆厂一位热爱蒸汽机车的工程师发现，并妥善保存下来，这国产首台“火车头”最终的命运或许就像它的大多数“兄弟”一样，退役报废，解体成废旧钢材回收利用。

因为热爱蒸汽机车，这位大同工厂工程师始终在寻找这辆国产首台蒸汽机车，当他最后在淮南机务段场站角落发现“八一”号时，欣喜异常。通过双方协商，大同机车车辆厂将退役的“八一”号保存起来，此后“八一”号作为国产首台蒸汽机车，多次参加相关展览。

“八一”号的娘家人——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近年来也一直打听它的下落。2008年，南车青岛四方公司获悉“八一”号保存在大同工厂的消息后，两年时间内，三次赴大同，为“八一”号能荣归故里与大同工厂展开协商，在南车青岛四方公司喜迎建厂110周年之际，大同工厂将机车赠送给南车青岛四方股份公司。

考虑到年迈的“八一”号已经不能再在铁路上运行，四方机车厂最终决定通过汽车将其运回。于是，为了把近百吨的“八一”号拉回家，南车青岛四方公司安排了三辆大平板车，将机车整体分解成三部分，用了三天三夜跨越上千公里才让它平安归来。

■ 山海经

黄巢点将台

□ 石奇亭

在菏泽城西，有一座高大的土堌堆——曹州点将台，菏泽人称它为黄巢点将台。点将台呈方形，高约四五米，广十数米，北和西北丈许有合抱粗大树若干。

被称为黄巢点将台的地方，国内不下八九处，广东、福建有，河南、陕西有，山东有，河北也有。外省这些地名的来历，多是当年黄巢军驻扎发兵的地方，惟独曹州点将台既是黄巢在这里发起起义，又曾在这里驻扎发兵。

相传黄巢先后五次在这里点将。黄巢生于曹州冤句，也就是现在的菏泽。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领导起义军南征北伐，东进西杀，几度兴衰起浮，最终夺取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随后又丧失了政权，兵败于泰山脚下。大齐政权就此画上了句号。黄巢作为一个叱咤风云、建立大齐王朝的人物，给后人留下诸多悬疑。黄巢点将台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黄巢点将台么？菏泽社会科学联合会秘书长荣海生认为，民间传说是可信的。史无记载，主要缘于三个方面。一是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留下的可靠史料少。二是从黄巢起义开始到北宋建立，持续的战争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所到之处，典籍多被焚烧，墓葬也多被挖掘。黄巢起义失败后，无赖出身的朱温挟持皇帝迁都，将长安夷为平地，致“向时遗籍，尺简无存”。而历史上，汴州、曹州、濮州等地都曾多次被黄河淹没城圮后重建，其他的小城镇和村庄就更不用说了。三是官方和民间两种不同的观念，以及唐末政治的混乱，也造成了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不一致。更何况在历代当政者眼里，黄巢是流寇，谁还为他树碑修志呢。

在黄巢点将台的东南角，立有一块石碑，碑记详细记录了这个堌堆的由来。这里原是明朝修建的一个教武场，清光绪六年叶道源撰修的《新修菏泽县志》载：“城西三里许有高阜名凤嘴山，正德间副使吴学命义官董懋筑台，高一丈，广四亩，演武厅三楹，置地三顷为教场，台左有旗帜庙……”菏泽城于北魏488年始建，隋末唐初因战乱而废，金大定年间曹州府迁居于此，“其时有无城堑旧志无传焉”。南宋时黄河泛滥，大水平地逾丈，城圮于水。明洪武时黄河水患又废城址。其间还多次历经战火、建制废兴，现之地貌与唐之地貌已面目全非，地方史志也多遗失。对于黄巢点将一说，则无一字记录。

那么，这里是如何和黄巢扯上关系的呢？荣海生说，从875年黄巢发动起义至884年失败的近10年时间里，黄巢在南征北伐中，曾经有五次兵临家乡菏泽。当时的凤嘴山高高隆起，适宜于点将发兵。第一次，875年6月，黄巢在冤句起兵后，他带领几千人马迅速往东北方向行军与王仙芝的队伍会合，途经了现在的点将台这个地方。第二次，在蕲州王仙芝欲投降朝廷，黄巢与王仙芝分裂。一路北上的黄巢率军智取郓州(东平)。之后，受到唐朝大军的合围，被迫再次南下，877年6月，在准备攻打唐朝大将宋威镇守的曹州前，曾驻兵于此。随后，王仙芝、黄巢合兵攻打宋州，没能攻下。王仙芝撤回湖北境内，一路向南挺进的黄巢，遭到了唐朝大将张自勉的迎头痛击，调头急行军到了琅琊，后又转战向西到了考城，即现在的兰考，接着向北占据了曹州，途经这里向北到达濮州，这是黄巢第三次在这里点将发兵。879年闰十月，自号冲天大将军的黄巢率百万大军北伐。880年9月，黄巢北渡淮河，分兵多路进取洛阳，黄巢第四次与这里“结缘”。884年，一路败退的大齐皇帝黄巢，被李克用的沙陀兵一路追击到了曹州境内。此时的黄巢，一如当年的西楚霸王，倍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于是在这里进行了最后一次点将散兵。由此，后人就把凤嘴山改名为黄巢点将台了。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韩复榘山东剿匪

□ 宁 阳

民国时期中国的匪患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辛亥革命之后的10年里，很多报纸不把中国称为“民国”，而称为“匪国”，而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匪患最为厉害。山东的鲁南地区是土匪的老巢之一，到上世纪20年代末，仅临沂就有匪伙50余股。他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据后人统计，1912——1935年的山东省境内107个县，竟然84个县有土匪盘踞，其中仅势力较大的土匪就有370多股。其中孙美瑶、张鸣九、刘黑七等实力尤为强大，部属强盛时多达数万。

对平民百姓来说，匪事之灾大大猛于战事之祸。匪患严重破坏了百姓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生产，更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心理的恐慌。人口和财产的损失更是庞大。土匪为祸地方的手段多种多样。绑票，即架票勒赎，是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就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土匪不仅抢劫普通士绅，还常常在交通要道，抢劫汽车、轮船，乃至占据火车站。政府机关和外国人往往也是土匪眼中的“肥羊”，不能幸免于难。1923年5月以孙美瑶为首的土匪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民国初年，张树元、田中玉、郑士琦主政山东之时，政局相对稳定，政府有余力剿匪，匪患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张宗昌主政山东之后，导致匪患遍地。1930年9月5日，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自此始，迄至1937年秋韩复榘退出济南，主政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韩复榘为了巩固其在山东的绝对统治地位，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上任后提出的“四项行政任务”之一就是剿匪，也可见其对剿匪的重视程度。

临城劫车案中被劫上山的外国人质和劫匪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巩固其统治，韩把剿匪清乡列于施政纲领之中，不断训令、布告晓喻军队、地方党政及广大百姓，要求同心协力肃清匪患。为此还专门制订《守城剿匪办法》、《山东省民团剿匪奖惩办法》等条例、规定。训令部队、地方长官、民团组织等严格执行，有匪入境，合力兜剿，“不得借故无力抵御，相率走避”。剿匪有功者赏，不力者罚，并把这作为考核公务员的重要内容。韩复榘在1930年11月公布了《验枪办法十条》，对民间枪支加强管理。严格规定民间持有枪支的数量，并加以烙印甄别。此外，严禁民间私造军火，严禁铁工厂私修枪械，违者即严加惩处。

韩还采取了剿匪与“清乡”结合、军民合作的做法。他主张组织民团、联庄会等地方武装，培养民众自治、自卫能力，县长要按时下乡，召集民众讲演剿灭办法，以期弭患于无形。为拔除土匪窝藏地点，他把剿匪与“清乡”结合起来。他自任鲁豫清乡督办兼山东省清乡总局局长，在开封设督办署，在济南设山东省清乡总局，在土匪活动的重点地区设立清乡司令部。为对付土匪，采取“以匪制匪”的特殊办法，重用熟悉土匪的“降匪”组成“特别侦探队”，以侦探土匪行踪，成为韩复榘剿匪的利器。“特侦队”下设两个大队，以“降匪”刘耀庭、张步云为两队队长，直接受第三路军总部领导，实际是韩亲自指挥。当时山东没有战事，军队的经常性任务就是剿匪，剿匪之战斗几乎无日不有。遇有特殊情况，他亦亲自督阵清剿。

当时鲁南山区有土匪三大股：孙美瑶股，约3000人，据有抱犊崮；尹土贵股，亦约3000人，据蒙山；王百川股，据良崮(临朐境)。韩复榘“誓必扫清巢穴”，亲自任总指挥，以第三路军为主力，协以友军分路进剿鲁南各匪。韩复榘亲临前线督剿，各军配合形成对土匪包围之后。4月16日，韩下达总攻令。土匪则凭借天险，在山上筑石垒顽抗。韩下令放火烧山以去其屏障。韩复榘电令剿匪各军：“凡捕俘匪首领者赏洋五千元。”继又电令各军“获匪一律枪毙，通匪一律枪毙”。至中旬，土匪被歼十之六七。针对土匪占据抱犊崮有利地形，据险顽抗，他下令予以根诛：对匪区除妇孺外，凡15岁至50岁男子，如无“连环保”者一律枪决；并将抱犊崮山区藏匿土匪的村庄择要焚毁。至5月4日，鲁南抱犊崮土匪基本肃清，被捕土匪多被当场杀戮。到1933年1月，鲁南土匪基本被肃清。当时的天津《大公报》积极评论了对抱犊崮的清剿，“事系华北之全部治乱”，认为他“躬自督策”，“不但是为地方除害，且为国家纾莫大之隐患”。

刘桂棠，即刘黑七，民国山东巨匪。韩复榘于1934年3月21日亲率手枪旅两营赴泰安坐镇指挥围剿，强调刘匪不绝，绝不发饷，来提高部队的战斗积极性。3月21日起，韩军与匪军先后在梁山、郓城、安驾庄等地接战三次，将匪击溃。4月中旬，当韩复榘再次听到刘黑七的残部逃走后，气得发疯，要亲上前线剿匪，还跳脚大骂：“这么几个土匪都打不了，我们还有什么脸再干。”后韩复榘又派大军追击残匪，并请中央空军飞机支援，经过40天的战斗，最终刘黑七的匪部被全歼，刘黑七仅只身逃到天津租界。韩复榘因匪首刘黑七的逃脱深感愧疚，乃向国民政府辞职，后因蒋介石挽留而留任。隐藏在租界的刘黑七匪心不死，曾几次派人到山东活动，都被“特侦队”抓获。韩复榘随后雇刺客进行刺杀，刘黑七身中三枪，竟然未死。

韩复榘对土匪的清剿安定了地方社会。然而随着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局混乱，战事频繁，山东各地的土匪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地方。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土匪问题才真正得以解决。